

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

林 嘉 煌

人类学，顾名思义是一门研究人类发展过程的科学。随着科学的发展，以及时间和空间的不同，对于人类学本身内涵和外延的认识也是变化的。各国学派、各学者之间的看法和意见不尽相同。请看如下一些辞目的解释。

《国际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的解释是：“人类学，它的名称从词源学上来说是‘人的研究’——它是关于人类研究最全面的学科群。全面性在于它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地理学的和年代学的范围相关联。事实上它是人类科学中唯一研究其体质的和社会文化的两个方面的学科。”^①

《英国大百科全书》说：“从词的来源看，人类学是人的科学，而实际上，人类学仅仅是人类各种科学中的一门科学。它把这样一些学科综合在一起，这些学科的共同目的是在居民的生物特征和文化特征的基础上描述人、解释人，并通过时间的推移来强调这些居民的变异和进化。以种族的概念为一个方面，文化的概念为另一方面，二者都已受到特别的重视。”^②

《美国百科全书》说：“人类学是从生物学的观点和文化的观点来研究人类。涉及到把人类当作一个动物那部分人类学称为体质人类学。涉及到生活在社会里的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生活方式那部分称为文化人类学。”^③

《日本中文大辞典》说：“人类学：为就人类而研究一切事项之科学也。内容有下列诸问题：一、人类之特征，二、人类之地

位，三、人类之由来，四、人类之系统，五、人类之地理之分布，六、各种族性质之异同及其原因，七、人类之文化，八、人类之改良。故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遗传学等均有密切之关系。”^④

《苏联大百科全书》：“人类学是关于人类起源和演变、人类种族的形成和人类体质结构的正常变异的科学。”^⑤

《辞海》：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的体质特征，类型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包括从猿到人的演变过程，人体发育中的体质发展和增进，世界各地人种的形成过程，地理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人类学不仅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而且与社会科学有密切的关系。主要分科有人体形态学、古人类学和人种学等。”^⑥

说明三点：第一，对人类学的定义、对象和范围的意见和看法是不一致的，第二，主要的意见可以归纳两种：一种认为人类学是人类研究最全面的学科群，它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另一种意见认为是研究人类体质的科学，也就是体质人类学或叫自然人类学。第三，主张人类学只是研究体质人类学的，也认为人类学与社会科学有密切的关系，是自然科学过渡到社会科学的桥梁的科学。苏联莫斯科大学人类研究所也正在从事“在人类作为物种形成各个阶段上，生物学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相互关系问题的工作。”^⑦

我国对人类学多年没有提倡，某些分支学科中断。粉碎四人帮后，现在把它恢复建设起来。人类学工作者批判地继承中外前人给我们留下极其丰富的珍贵的人类学遗产从我国国情出发，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求同存异，从实践中建设和发展我国人类学体系。

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是人类学研究的两个主要的分科。人就其本身的形态来说，有其起源和发展

的过程。人从动物分化出来，源于动物，具有自然属性，但是人又超出动物，与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人能劳动，有语言，有思维，会制造工具等等，有社会属性。也就是说，人类从动物状态分离出来，就同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同时产生不可分离的辩证发展的关系。没有文化的人类是不存在的。因此，人类学在研究人类体质的发生和发展、演化的同时，就必须研究人类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离开人类文化的人类学实际是不存在的。

体质人类学或称自然人类学、人体学，是研究人类自身的起源、分布、演化与发展，人种形成以及现代人种、种族、民族的体质特征、类型及其变化的。主要分科有人体形态学、古人类学（或称人类起源学）和人种学等。

文化人类学主要是研究人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的规律。它的内容包括语言的起源与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人类社会制度、社会组织、婚姻形态等。精神文化包括绘画、雕刻艺术、神话传说故事、宗教信仰、舞蹈、谚语、风俗习惯等。

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的社会发展有极其重要的论述，为科学人类学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代表了无产阶级人类学理论。前者深刻地阐明了劳动创造人的光辉学说，恩格斯把人类的诞生与人类创造物质文化、语言和社会的产生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论述。他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⑧，而“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的作用中，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⑩，同时“由于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⑪。所以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把人的体质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的创始人。后者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文化人类学的著作，论证了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奠定了以社会经济形态为基础

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文化、社会制度等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人本身的两重性、人和社会的关系，有着极其深刻的论证和科学名言。恩格斯指出：“人，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⑫，“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⑬；但是人又是社会的人，所以他又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⑭。马克思引用亚里士多德语：“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或许能做到——就象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⑮。这里把人是自然和社会的两重性，人与社会以及语言的发展与社会的关系，刻画得淋漓尽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一哲学手稿》中论述人是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时，从哲学高度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与别的自然物有着质的区别，人“赋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但是“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他还是属人的存在物，……因而是类的存在物”，而且“人也有自己产生过程即历史”，所以他说“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⑯。马克思论证了人、人类是自然物和社会物相结合的辩证统一。这个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人类学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沿着自然（体质方面）和社会（文化方面）进行综合的考察。同时这些论述也说明：作为学科，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密切关系的程度。

所以人类学工作者要把人类体质和文化综合起来探索。许多学者把人类的生产工具作为“指示器”来探索人类起源的时间和空间。众所周知二十年代在非洲发现的南方古猿，由于当时没有发现石器，所以是人是猿争论不休，“近年来，发现南方古猿的一些进步类型，已能制造工具”，即发现了石器，人们才承认了这些“古猿”是人，这一场“官司”打了五十年才告结束。同时也

把人类的历史向前推移到两百万年。即使是主张人类学只是研究人类体质的苏联学者，实际上在研究和叙述人类起源时，也结合石器来考察。石器就是人类的物质文化。我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研究古人类方面就有研究人类化石和旧石器的组织，俗称“人头组”和“石头组”。说明人类体质和文化的密切关系。

其次，任何事物都是相互作用的，它们是互相制约的，又是互相促进的。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互相促进向着纵深的研究方向发展。

人是从动物分离出来的，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辩证统一，自然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也都同时辩证地对人发生作用。恩格斯说“事物是互相作用着的，并且在大多数情况，正是忘记了这种多方面的运动和相互作用，阻碍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去看清最简单的事物”^⑯，他认为“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是宗教的观点。他论述了劳动创造人，只有人才能创造文化，“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笨重的石刀”^⑰，而“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髓不仅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在社会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活动，提出和达到愈来愈高的目的”^⑱。随着完全形成的人出现、人类体质的发展，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和支配自然的能力也在发展。人类制造的石器由粗糙简单向着定型、小型多样和复合的方向发展，制作方法从打制到磨光。工具的改革表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工具改进的带动下，其它方面也相应发生发展起来，劳动愈来愈复杂，变得更加完善。“与此同时，劳动使人的体质得到发展，适应着日益复杂化劳动的需要。人体的发展，反过来促进文化进步。这一切使古人类越来越多地获得自由，并推动着原始社会越来越快地发展”^⑲。人类生产从采集、渔猎经济，进而发明了农业、畜牧业、制陶、纺织、冶金和航行；同商业和手工业一起，出现了艺术和科学；社会组织也从部落发展到民族和国家。从而产生了政治、法律以及宗教等

上层建筑。恩格斯指出：“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髓的发展和活动”^⑯。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人类体质的发展和社会物质文化的发展，特别是旧石器早期，两者的发展基本是相符的，往后人类社会文化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到了山顶洞人，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形成了现代体质类型；以后，人类体质特征的变化不大显著，形不成人的新种。但是人类文化社会的发展是越来越迅速，社会发展规律作用远远超过生物学发展规律的作用。石器时代的时间占人类的历史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而不到百分之一的时间人类的文化从铜器进入了核子和太空时代。

人类社会和物质文化对人类体质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的产生，使人类的发展“一方面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确定的方向”^⑰。同时火的使用和动物的驯养，使人类更加缩短消化过程，更加丰富了肉类和乳制品等经常的食物来源，这两种具有决定意义的进步，“就直接成为人的新的解放手段”。食物愈来愈复杂，就在血液中增加新的化学成分，肉食是现成地包含着为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材料，特别是对脑髓的影响，脑髓因此得到比过去多得多的为本身的营养和发展所必需的材料。北京猿人的脑容量平均为1059毫升，脑壳几乎比现代人厚一倍，整个头骨很厚重，前额低平，眉脊粗大，颧骨很高，鼻子宽扁，嘴巴向前伸，没有明显的下颏，牙齿比现代人粗大。但是北京猿人已经能够用火，熟食，结束了“茹毛饮血”的时代，扩大了食物范围，缩短食物消化的过程，减少疾病，促进体质的发展；用火又可御寒、照明、改善居住条件，扩大活动的范围，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这样一代又一代相传，劳动生产的发展，食物的改善，人类体质也逐渐得到进步。到了山顶洞人脑量则为1300—1500毫升，已在现代人脑量变异范围之内。脑结构日趋复杂，头颅高度扩大，颅骨厚度变薄，前额倾斜减少，眉脊骨趋向扁平，上下颌骨后缩，齿冠和齿根由大变小，咬合面的纹理由复杂趋向简单平整，整个嘴都明显

后缩。山顶洞人的头骨，具备了现代人的基本特征。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提高，营养的变化，人类的体质也在变化。法国《世界报》1981年5月14日报导：自从本世纪初以来，法国人特别是法国男子的身高有了增加。现在，法国男子平均身高是170厘米，妇女平均身高是160厘米。然而在社会各职业阶层之间也存在着差异：生活条件最差的阶层的居民个子较矮小。各社会职业阶层居民的身高从矮到高的依次顺序是：农民、工人、服务人员、职员、中层干部、老板、高级干部、自由职业者和大学生。男大学生的身高平均达175厘米。高级干部的身材比工人高了3厘米。妇女这种现象表现没有这样明显。调查者认为出现这种高矮差异与食品有关，同时也与社会遗传有关：因为婚配的男女双方往往同属一个阶层，“这样选择配偶就保持了大众阶层同特殊阶层在身材上的差异。”

但是各社会职业阶层在体重上的差异情况正好与身高方面相反。调查发现大学生、职员、干部和自由职业者的体重较少超过公认的“理想体重”标准，而在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工业家、商人和退休工人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超过这一标准。调查者认为这是由于各社会职业阶层吃的食品不同而造成的。^②

阿尔及利亚《人民报》81年5月2日报导：日内瓦的国际卫生组织发表一份报告说，在发展中国家里有三亿残疾人。如果目前的发病率继续上升，那么到2000年，仅在发展中国家的儿童中，就会有一亿五千万人残疾。

报告还说，在发展中国家里造成残疾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营养和经常流行的各种传染病；而在发达的国家里造成残疾的原因是慢性病和车祸。^②

这表明社会、物质文化对体质的影响和关系。所以国外学者对体质调查和人类生态研究结合，综合分析人群间差异和人类营养生态的关系，如地区、民族、阶级之间的差异。日本学者高桥英次认为身材与食谱中乳制品的数量有明显的正向相关，从而他解

释中亚人群较东南亚高大，东非游牧部落较东非农业部落高大，北欧人较南欧人高大的原因^⑯。

我国解放前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人民生活贫困，饥寒交迫，体质较差，被帝国主义者讥为“东亚病夫”，寿命平均很低，只有35岁。解放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普遍得到提高，卫生医疗条件大为改善，体质健康大大增强。古云“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人活八十不稀奇。据报载：上海市区人口和年龄进行了普查，证明上海人的寿命越来越长，百岁老人日益增多。

上海市区人口普查，已作过几次，长寿老人一次比一次增多。1964年，上海市区80岁以上的有一万四千四百多人，占市区总人口的千分之二点二五；岁龄最高的97岁，只有1人；1973年，上海市区80岁以上的有三万零三百余人，占市区总人口的千分之五点四七；百岁以上的有6人，最高的1人为105岁。^⑰到1979年12月31日止，在上海市区，80岁以上的共有四万七千四百多人，占市区总人数的千分之八点零二；100岁以上的“老寿星”有21人，其中男性3人，女性18人；年龄最高的是103岁，共3人。

最新统计，上海居民平均寿命为74岁，其中男性72.8岁，女性75.3岁，而三十年前上海居民平均寿命只有44岁。同时上海人的身材也有了增高，男子平均身高为167厘米，但大学生已达170厘米。

生活改善，也反映另外一面，即人口死亡率的降低。解放前，我国人口死亡率一般在千分之二十八左右，1979年降为千分之六点二。我国目前已是世界人口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全国人均寿命到1975年延长到68岁，比旧中国人均寿命只有35岁，增长近一倍，比1976年世界人均寿命59岁还高9岁。^⑱

美国有人对移民作调查研究表明饮食和其他环境对头骨指数也会发生变化。在本世纪初，美国人类学家鲍亚斯（1858—1942年）的倡导，对移民作调查研究，考察多年，“证明了移民儿童

的头骨指数往往和他们父母不同——比起他在老家的近亲的差别更大。这就是说，饮食和其他环境上的因素的改变，不仅可以影响皮肤和头发的颜色，甚至连带到一个人的骨骼发育”^{②9}。

牙齿也是体质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材料之一。从猿人到现代人牙齿的进化来看，齿冠和齿根由大变小，咬合面的纹理由复杂趋向简单平整，整个牙床后缩。这个进步与人类食物的进步是分不开的。人“牙的磨耗与当时人吃的食品的粗糙、细软和咀嚼范围有关，这些情况古人与今人都有不同”^{②9}。从现在牙科临幊上看，人们食品的不同，如吃粗粮或细粮牙的磨耗，以至地区和职业的不同，牙的磨耗也不同。吴汝康教授认为“牙齿萌出时期有种族上的差异，也与营养条件等因素有关”^{③0}。牙科专家说上海地区临幊：第三白齿萌出率不高，这是因为婴儿多吃乳糕等软的食品，无需牙咬。他们还认为假如长此以往，老是吃细软的东西，将来人的第二白齿也可能不出，那么下颌骨也就进一步后缩。

第三，婚姻对体质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人类社会生产是人们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③1}。所以马克思说：“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是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③2}这说明人类婚姻表示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关系及其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婚姻家庭制度的发展对人类自身（体质）和社会制度发展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婚姻制度是变化发展的，通过自然选择的原则，人类长期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婚姻对种的蕃衍和体质的影响。

恩格斯在论述婚姻对体质的影响时引用摩尔根的话：“没有

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创造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两个正在进步的部落混在一起了，新生一代的颅骨和脑髓便自然地扩大到综合了两个部落的才能的程度。”^⑬在谈到婚姻家庭形式对社会的制度影响时指出：“不容置疑，凡血缘婚配因这一进步而受到限制的部落，其发展一定要比那些依然把兄弟姐妹之间的结婚当作惯例和义务的部落更加迅速，更加完全。这一进步的影响有多么强大，可以由氏族的建立来作证明；氏族就是由这一进步直接引起的（指普那路亚家庭——引者注），而且远远超出了最初的目的，它构成地球上即使不是所有的也是多数的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基础，并且在希腊和罗马我们还由氏族直接进入了文明时代。”^⑭

假如说恩格斯上面的论述是对原始社会的，那么我们来看看现代人近亲婚配对子代体质健康的影响吧。

现代科学证明婚姻对体质的影响，血缘婚配的亲属之间在遗传学上是十分重要的。也是人类学注意的一个问题。美国遗传学家斯特恩谈及近亲结婚对子代体质的影响和畸形，发病率以及死亡率都比非血缘婚配的高。他指出：“血缘亲本的子女往往各种性状上都比无关配偶的子女得分低些。……比如，像头围、胸围、头长和身高等各种人类学测量数据在血缘婚配的日本儿童中都要低些。在功能方面近亲婚殖的日本儿童开始走路的时间一般比对照晚几天。小儿说话的时间也是如此。”^⑮

近亲婚配子女比非亲本子女的死亡率也高得多。“意大利群体中1903—1907年间登记的各种类型婚姻之子代到达21岁前之死亡率：非亲属百分之二十点二，第二堂表兄妹百分之二十二点七，堂表兄妹百分之二十七点八，亲堂表兄妹百分之二十八点九”。^⑯

上述资料说明婚姻对于人类体质、人类遗传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早期发育、畸形缺陷发病率以至死亡率都有直接的关系。婚姻是属文化人类学范畴，是一个分支，这也反映了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

再次，体质人类学可从对人类骨骼进行年龄、性别鉴定的材料中，对考古学物质文化的互证作用，来了解当时的社会制度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例如年龄、性别鉴定与埋葬制度、随葬品性质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是成年合葬或是小孩合葬、夫妻合葬，也可以反映出是父系或母系，对偶婚、一夫多妻或是一夫一妻的社会制度；同时从随葬品的性质也可以联系到当时的经济状况；对年龄的统计，可知这群人的年龄分布和死亡率以及当时的生活情况。

风俗习惯、埋葬方式与尸体保存习俗等精神文化，对于体质人类学的人种及性别、年龄的鉴定，也起着互证的作用。畸形头从古到今普遍地存在于全世界。有的属于无意识的，有的属于有意识的风俗人工畸形。无意识的就是将婴儿放在摇篮中，使部分或整个枕骨变扁平。有意识的就是将头骨额部用木板压着，或用有抵抗力的沙带，在后面放在摇篮的木板上，这样两面施加压力，结果使额枕径缩短，而未受压的顶骨部则向两侧伸延。另一种方式就是将头用布包裹起来，这样使头呈环状畸形。这种风俗在古代秘鲁人、北美、南美洲和刚果一些民族尚保存着。性别方面有时女多，有时男多。我国大汶口的新石器时代的头骨是人工畸形，枕部扁平为百分之九十以上，性别男女相等。拔牙的习俗，也较普遍，太平洋群岛一些民族也有这样的风俗，我国台湾省某些高山族和贵州某些地区的仡佬族也有拔牙的习惯。在新石器遗址中，发现许多遗址如大汶口、西夏侯、山东野店、江苏邳县大墩子、常州圩墩、福建昙石山、广东增城金山寺、河南淅川下王岗和湖北房县七里河等遗址，都发现有拔牙痕迹的头骨。大汶口新石器时代的头骨，发现拔去侧切牙的女性占绝大多数，而年龄大都在12岁以后。从当时遗址的分布看，当时我国拔牙风俗已波及东南沿海、华南和汉水流域的辽阔地区。拔牙的特征也十分相似，除七里河遗址同时拔去左右上领外侧门牙和犬牙外，其它都是拔去左右上领外侧门牙。从拔牙时间的顺序看，从大汶口起，随着时间的前进而逐渐扩大，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最为广布，

以后又逐渐减少，至今仅在我国个别地区的少数民族仍残存敲牙的风俗。

风俗习惯与活体测量的关系。近两三年来上海体质人类学工作者组成中国民族体质调查组，他们奔赴云南、黑龙江、内蒙等地进行活体测量，感到风俗习惯与人体形态有关，在进行活体测量的同时也要注意了解研究风俗习惯等文化人类学的知识。例如白族的成年妇女初看发缘点高，额面长，仔细观察是拔发的原因，经了解这个民族在结婚时需拔发即咬面的习俗，表示已婚，所以与未婚姑娘的发缘点显然不同。一般人耳朵有三角形、平形和圆形等三种形态，而基诺族因戴耳坠只有圆形的。假如对于各族的风俗习惯等精神文化不了解，那么测量的数据也就不科学了。

综上所述，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是多方面的。从理论上说或者在实际的应用研究都离不开人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没有文化的人类是不存在的，没有人也就没有文化。

仅就应用人类学而言，已经冲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界限。进入科际之间的合作，协同研究，向综合研究与研究中心方向发展。比如人类工效学是运用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现代人类生产、生活、国防、轻工、体育、汽车、衣着等等实际问题进行研究，是应用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它实际上研究的范围已超出了体质人类学而包含着文化人类学的内容。应用人类学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调查方法，研究社会生产、生活的规律，提出解决的办法。现在应用人类学已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各生产部门和社会各方面，范围越来越广泛。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没有绝对的界限，它们的发展在许多领域中互相渗透，不少国外学者运用跨学科综合研究，取得很大成绩。因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共同点，即都追求客观性和规律性，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无论什么学科都不可能完全闭关自守。那么人类学既然是自然科学过渡社会科学的桥梁，就必须

打破闭关自守的藩篱，认识相互关系和相互促进的作用，加强综合研究。在科学发展的征途中，有很多边缘学科，很多事情还不为人们所认识，所以有的研究必须全面的、宏观的、又是深入的，这对于繁荣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是大有好处的。

我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民族众多，是一个极其丰富的人类学宝库。同时我们在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也需要有健康的体质来完成这个使命，因此在建设和发展我国人类学体系，为实现四化服务时，结合体质和文化进行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注释：

- ① 中国人类学学会编：《国外人类学》（一），1981年，第1—2页。
- ② 同①，第56页。
- ③ 同①，第85页。
- ④ 《日本中文大辞典》（一），1962年版，第757页。
- ⑤ 中国人类学学会编：《国外人类学》（二），1981年，第1页。
- ⑥ 《辞海》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96页。
- ⑦⑧⑨⑩⑪⑫⑬⑭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5页、19—20页、149页、151—153页、159页。
- 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
- ⑯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0—122页。
- ⑰ 同⑦，第156—157页。
- ⑱ 同⑦，第150页。
- ⑲ 同①，第156页。
- ⑳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编：《中国古人类画集》，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 ㉑ 同⑦，第156页。
- ㉒ 同⑦，第153页。
- ㉓ 转引《参考消息》1981年5月下旬。
- ㉔ 同㉓。
- ㉕ 高桥英次：《人类身长的地理分布环境的要因》，《人类学杂志》1971年第79卷第3期。
- ㉖ 参见《解放日报》1980年3月19日第1版。
- ㉗ 参见《世界经济导报》1981年10月19日。
- ㉘ 莫顿·克拉斯、哈丁·赫尔曼著，胡叔仁译：《人种面面观》，（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3年12月，第43页。
- ㉙ 颜闇：《人类学与考古学的关系——人类骨骼性别和年龄的鉴定》，《考古》

1961年第7期。

- ⑩ 吴汝康、吴新智：《人体骨骼测量方法》，科学出版社，1965年，第12页。
- ⑪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4页。
- ⑫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3—34页。
- ⑬ 同⑪，第44页。
- ⑭ 同⑪，第35页。
- ⑮ 斯特恩著、吴曼译：《人类遗传学原理》，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06页。
- ⑯ 同⑮，第304页。